

近代奏议文献概述(上)

皮明勇

近代奏议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史料之一，但很少有人对这类史料本身做过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对近代奏议做一综合性的探讨。

一、近代奏议概况

(一) 近代奏议以收录奏折为主

近代奏议是近代臣僚上奏皇帝的奏报公文专集、汇编、选编的合称。近代臣僚主要是指鸦片战争后七十二年间的清朝官员。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但小朝廷仍然存在了一段时间，少数遗老大臣继续上奏，也有一些奏报传世。近代奏议所收录的奏报公文既包括奏折，也有题本，还有电奏，但以奏折为主。

自古臣僚向皇帝进言，都有一定的文体，或称奏、章、表、议、启、封事、札子、弹章等等。清初沿袭明制，臣僚上奏主要使用题本和奏本。凡行政、军事、钱粮等公务皆用题本，由官员盖印具题，私事则用奏本，不准盖印。奏折大约是在康熙年间适应君主专权的需要而出现的，一开始时具有秘密报告的性质。因所用纸式系折本，所以称为奏折或折子。

奏折出现之后，发展很迅速，逐渐成为正式的上奏公文，并形成了一套统一的行文格式。一个奏折从首至尾共十三版半，第

一版是掩首，第二版是折面，正中写一“奏”字，第三版至十二版为正文部分。第十三版不写字，后面半版为封底。奏折每两版为一开（又叫一扣），每开共十二行，每足行写二十字，平行写十八字，所余二字之空为预备抬头之用，如有三抬，则高出一格书写。第一开右边第一行写具奏人衔名并“跪”字或“谨”字。第二行“奏”字单抬，下接“为”字，再下写事由，后面便是正文。正折写完后，写上“伏乞皇上圣鉴”等固定套语结尾。折尾正中写年、月、日。奏折密封直达御前，由皇帝拆阅，用硃笔作批示，这种批示称为硃批，批过的奏折叫硃批奏折。硃批奏折转送军机处，由军机章京将原折和硃批缮录一副本，并注明奉批日期，形成录副奏折，按日排列，每半月打成一包存档备查。

官员奏折中常常带有夹片，或称片奏，用来报告或请示那些不适宜用正折上奏的事情。夹片随正折一同运转和处理，但没有封面、没有事由、没有具奏人衔名和上奏年月日，以“再”字起头直书其事。因此，它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件，而是从属于正折的，但其中往往有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奏折一般可带二、三个夹片，亦有多达五、六个的。

奏折作为清朝正式公文，其地位不断提高。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政府下令停止使用奏本，题本则仅可用来报告例行公事，奏折成为最主要的上奏文种。到了近代，奏折进一步排挤题本，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稍为重要的事情都靠奏折上奏朝廷。近代奏议中虽偶尔也收录一些题本，但绝大多数都是奏折。故奏折是近代奏议所收奏报公文的主体。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由于电报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电奏。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各种紧急事件不断发生，而奏折靠旧式驿传迟滞不灵，从上海到京师要八天，从广州到京师需十多天，先是外人在华首设电报，清政府因而效之。外省督抚、将军、大臣等遇有紧急事件，迳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或军机处，请其具折代

奏。这种电奏文字扼要，结构简单，虽然清政府始终不把它们看成正式公文，但他们的使用范围愈来愈广，具有奏折的主要功能和效用。甲午战争以后有关外交、战争等方面的紧急公务基本上都用电奏处理，奏折在这些领域失去了重要性。实际上，电奏是奏折在近代通讯条件下的一种变体。因而电奏便成为近代奏议所收录奏报公文的另一部分。

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奏折本身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先后任内阁总理大臣，对奏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奕劻内阁时，内外官员上奏必须先递至内阁，由内阁总、协理大臣等拆阅，票拟批答意见，然后进呈皇帝（实际上是摄政王载沣）批准，作为谕旨颁行，总、协理大臣会同各关系部大臣在谕旨尾后署名。这就打破了原来奏折密封直达御前，皇帝独自硃批的规定，实际上是以奕劻为首的皇族亲贵对君主专制权力的分割。袁世凯内阁更进一步规定，“除照内阁官制得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咨内阁核办，其必应具奏者暂由内阁代递，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仅以阁令行之”。有关皇族事务，可以仍旧由内务府等机构直接上奏，但须即时知照内阁，并不得涉及国务^①。这个新规定取消了一般官员直接上奏皇帝的权力，内外奏折一部分改为对内阁的咨文，另一部分由内阁代奏。皇帝对奏折的处理权力被剥夺，由袁世凯操揽大权。奕劻内阁和袁世凯内阁存在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形成的一些奏折成为近代奏议所收奏报公文中比较特殊的一部分。

（二）近代奏议的传世数量、形式及其条件

近代奏议的传世数量很大。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诏令奏议类》、日本《东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还有许多近代奏议不见于上述目录，它们散藏在各地图书

馆，有待我们搜集整理。这些奏议的编刊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下列几类：

1. 综合性汇编。如：《道咸同光奏议》六十四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久敬斋石印本；《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八卷，光绪元年（1875年）刻本。这类综合性奏议汇编的编排特点是，选择一些当时人较感兴趣的奏报罗列在一起，部头较大，但成书种数有限。

2. 专题选编。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二十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上海书局石印；《邮传部奏议类编》，清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这类奏议各自围绕一个或数个专题选择材料，收录与之有关的奏报。它们的部头也比较大，种数亦不太多。

3. 个人辑录。以个人辑录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很多，其中大多数是奏议专集，计约三百余种。这种奏议专集，我们依据其题名方式又可分为：

以谥号题名的，如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

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左恪靖侯奏稿》，初编三十三卷，续编七十六卷。

以官衔题名的，如程德全《程中丞奏稿》十卷。

以别号题名的，如宝廷《竹坡侍郎奏议》二卷。

以籍贯题名的，如康有为《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以住所题名的，如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四十四卷。

以治地题名的，如张凯嵩《抚滇奏疏》四卷。

以本名题名的，如《刘坤一遗集·奏稿》。

近代奏议个人辑录的另一类型是全集、遗集、文集中所收录的题奏折报。近代大官名宦象曾国藩、周家楣、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周馥等人都有全集出版行世，其中所收的折报数量较多。《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三十卷本收录折片八百九十七

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六十四卷收录折片一千三百一十四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收录折片一千九百二十一件。遗集、文集中收录的奏报如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八十六卷中有奏报五十二卷。其他如徐鼐《未灰斋文集》、徐继畲《退密斋文集》等都收有奏报。近代奏议的个人辑录总计约有五百种,是近代奏议的最主要的传世形式。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是很受重视,刊印传世的较少。张之洞、李鸿章、杨文鼎、刘坤一、锡良、徐世昌等人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其中以《张文襄公全集·电奏》十三卷数量较多。

近代奏议大量传世的主要原因在于近代官僚士大夫对它们的重视。近代社会变化很快,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清政府要应付来自内外各个方面的冲击,无论是对外交涉、对内镇压,还是统治阶级的“自强”、“自救”,都是上谕频频,奏章累累。近代臣僚上奏的折报数量愈到后来愈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清朝历代宫中硃批奏折四十余万件,军机处录副奏折六十余万件,内阁题本二百余万件,其中大部分硃批和录副奏折属近代范围,内阁题本亦有相当部分是近代的。清朝君主高度专权,亲自过问军国大事,奏报是臣下向皇帝请示汇报的主要手段,在上下来往公文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近代官僚士大夫对奏报自然十分重视。那些关心时事大政的人,视奏报为关系“朝章因革,政治兴替,与夫民生之疾苦,利弊之倚伏”②的时政文献。他们往往对奏报要多方搜求,编刊流传。那些准备当官为幕者,则以当时名人奏议为范本,辗转传抄,设法模仿。上奏的官僚本人对其奏议更为重视,不少人视之为自己的著述。有人活着时亲自编刊奏议,陈夔龙、鹿传霖等便是如此。至于近代官僚的子孙朋僚,或为炫耀祖德,或欲替尊长“辨诬”“止谤”,对编刊奏议也很积极。另外,在近代还有不少人把奏议当成政治斗争的武器或宣传

品刊印发行。戊戌维新时期顽固派梁鼎芬、王先谦等刊印文梯、许应骙《许尚书文御史奏折》就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近代奏议广为流传，还与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有关，其时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当权，原来的清朝官僚从其阶级属性看，并未失势，他们的奏议仍得以大量印行。于荫霖、端方等人的奏议就是在民国年间刊印的。在1912年至1949年间，刊成的近代奏议有四、五十种。

（三）督抚奏议在近代奏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数百种近代奏议中，有极个别的属于“布衣上书”。贵州贡生黎庶昌曾以“伏阙上书”显名，其《拙尊园丛稿》收有他在同治初年所上的条陈。近代奏议的绝大多数是属于有上奏资格的官员的，大体包括下列几类：

1. 京师阁部大臣等官员的，有近百种。如军机大臣瞿鸿机《瞿文慎公文存》、侍读学士文廷式《文芸阁先生全集·奏议》，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张文达公奏议》等等。

2. 科道言官的，约计四、五十种。如御史尹耕云《心白日斋集》、赵炳麟《赵伯岩集》、胡思敬《退庐奏疏》等等。

3. 各省督抚的，如前举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奏议都是。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4. 驻防大臣和钦差带兵大员的，有三、四十种。如西宁将军文瑞《光绪绥远奏议》、驻藏大臣景纹《驻藏奏稿》、钦差大臣胜保《胜官保奏议》等等。

5. 京外其他中级官员的，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总兵等在内，他们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之多。

6. 驻外使节的，计约三十余种。如出使德、奥等国大臣许景澄《许竹笥先生奏疏录存》、出使英、法、俄国大臣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出使英、法、意、比国大臣薛福成《庸盦全

集·出使奏疏》等等。

上述情况表明，近代各类官员的奏议分布是不均衡的，督抚奏议最多，约占近代奏议总数的一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种状况取决于近代特殊的内外权力结构和各类官员的实际地位。

清初有资格上奏的官员较多。京官中可以上奏的有：大学士、六部九卿、科道；外官中可以上奏的有：将军、都统、大臣、监督、盐政（以上为旗缺）、总督、巡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总兵。但在近代，由于外重内轻局面的形成，地方督抚的权力迅速加强，各类官员的上奏情况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京官个人上奏不如外官多，外官奏事又多集中于督抚。

京堂以上官员之充任军机大臣者，有事向皇帝面奏，很少使用题奏公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多由其管理大臣（奕訢、奕劻）领衔具折上奏，且多限于重要外交事项。各部堂官凡公事须会衔上奏，大多是例行公事，他们亦可以个人名义上奏，但多系本职责任以外的事，如鸿胪寺卿黄爵滋的禁烟奏疏，也有些是空泛议论。科道官职司监察，所奏多为弹劾官吏，揭露官场黑暗，也有提建议发议论的。将军、都统、大臣任职边疆者，总理地方大政，所奏多为所管地区事务及边境交涉；在内地省分者不管地方行政的监督、盐政、学政在近代一般都不奏报本职以外的事。布、按两司在近代成为督抚的属官，除例行的到任、谢恩之事由自己具名上奏外，其他公事通常都上督抚详文，推督抚上奏。至于道员，和布、按同属监司，但地位更在其下，除台湾道外，近代各省道员很少上奏者。地方武职提督、总兵，官品虽高，但亦受制于督抚，且近代重文轻武，他们更少单独具折奏事。驻外使节，每有奏报，但多限于外交事务。相比之下，只有督抚奏报既多而又重要。一个近代督抚（河督、漕督例外）每年平均上奏折片一百九十件以上。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硃批和录副奏折，有百分之

七十以上是属于各省督抚的。这些奏报多与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敏感性问题相关，因此，它们比近代其他官员的奏报更受近代官绅的重视。另一方面，近代督抚又多有财有势者，有能力使其奏议传世。曾国藩死后，门生故吏遍天下，且大都在职在位，亟谋为他出版以奏议为主体的全集。李瀚章、李鸿章等三十多位显宦名士参与筹资编刊之事。曾国藩全集中的奏议三十卷，在他死后不久即刊出。传世至今的曾国藩奏议有十六种以上的本子。其他湘淮系督抚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奏议版本也都不少。正是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决定了近代督抚奏议在近代奏议中传世独多的情况。

（四）近代奏议的编刊和版本

近代奏议大多属于刊印本。这些刊印的奏议除了综合性汇编和专题性选编的材料来源比较复杂，及张之洞、钱宝琛、江忠源等少数几人的奏议曾从官方档案或其他官书中录取折片外，绝大多数官员的奏议都是依据他们的奏折存稿编刊的。

奏折存稿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近代官员在办理奏折公文时，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则和办法。尤其是各省督抚给皇帝的上奏，从起草、修改（核勘）、清缮、再修改（磨勘）、再清缮，直到最后发折，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其大致办法是：

一个奏折，由官员本人或其幕僚、书吏草拟。奏折草拟好后，由专门的幕客数扣（即断行）和修改，然后送缮书房用十二行二十十字红格折稿纸楷书誊清，交官员本人审阅，并由幕客再次修改，防止“忌讳字样，无意中于上下句联络”。一切合式，最后由缮书人再次清缮，并包封递发。

奏折递到皇帝手中，经过硃批，若系京官御史所上，即将原折直接送军机处存档，而将硃批内容另行通知上奏人。若系外省官员所上，则由军机处录副，然后将原折发还上奏人，作为朝廷的正式文件下达执行，但须按时（一般是年终时）回缴军机处存

档。若将奏折“留中”不发，便由军机处知会该上奏人“奉旨留中”。因此，内外官员在上奏后，出于政务和其他方面的需要，都要设法保存其奏折底稿。按照当时的习惯，大都把第一次誊清稿（即红格本）保存下来，并将硃批内容转录于上，赋予它私人备忘录的性质。这种誊清稿当时或称为“存稿”，或称为“稿本”，多数通称为“奏稿”。

这种奏折存稿由于是近代官员在办理奏折公文过程中形成的原始材料，因而保存了许多奏报内容以外的重要情况。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周馥《奏稿》（光绪三十年秋季），分三册，即为奏折存稿原件。这三册奏稿的每个奏折都分为折面、正文和折尾三部分。正文中有许多涂改和数扣的痕迹。折面包括折（片）名，何日发折，折弁何人，何时奉到硃批，硃批是什么等内容。若是驿递折片，还有何时辰发、日行几百里等情况。折尾除署周馥的衔名外，还标有奏折的定稿时间，并加盖闲章以示郑重。定稿时间即奏折通过审阅定稿的时间。由于各种原因，奏折在定稿后，经常要拖延几天才能正式递发。定稿时间往往比发折时间要早些。周馥的三册奏稿各个折片的定稿时间平均比发折时间早八天半，最长的相隔五十天。近代官员的奏折存稿原件多已散毁，但大量传世至今的奏议刊本、钞本多从其演化而来。

近代奏议的编刊，有由上奏官员自己主持的，但更多的是其子孙朋僚主持其事。周馥《周恝慎公全集·奏疏》是他儿子周学熙等编刊的。前述李鸿章等为曾国藩编全集则是上奏官员的朋僚为其编刊奏议之例。

编刊者一般要先确立一个选录折片的原则。近代官员中那些在职时间长，影响大，奏报数量多的人的奏议所收刊的折片较多。反之则少，有的只有几件或几十件。被刊入近代奏议的折片主要围绕三大中心：一是官员的各种建言折，即他们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问题的议论，编者想通过它们来表现上奏人的“宏猷

远略”。二是各种战报，这是许多官员的炫世资本。三是有关洋务、新政、宪政的奏报，这反映了近代官绅对时事问题的关心。被编者所舍弃的奏报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各种例行奏报，如四月和八月奏二麦及秋禾收成情况，每月奏上月粮价、晴雨情况，年终奏新赋完欠分数情况，等等。二是那些内容对上奏人不利或是有犯时忌的折片，如两广总督徐广缙、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人的奏议不刊或少刊有关他们对太平军作战不力，兵败城陷的折片。

近代奏议的编刊者对所选折片的内容要进行审订，有的改变原折的行文款式，个别的还对奏折的内容作一些改动。康有为《戊戌奏稿》有涉及思想内容的重要修改；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中的“倭”、“夷”等字句则被删改为“日本”、“洋人”等；周馥《周恂慎公全集·奏疏》抹去“孙逆”（按指孙中山）等字样。

近代奏议的编排方法，一般是前有序、总目，下列卷首，附录上奏官员的传、铭等。其正文折片除刘铭传、裕谦等少数几人奏议以事为类外，绝大多数都是按折片的上奏时间（个别的为出奏时间）之先后依次立卷的。首列折片名称，下标上奏时间，接下来即为折片正文。部分奏议的折片后附录硃批或相关的廷寄，个别的还有上奏地点。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奏议的内容提供了方便。

近代奏议的出版有三种途径：家刊、官刊和坊刊。成于家刊的如黎敬培《黎文肃公遗书》，光绪十七年（1891年）湘潭黎氏刊本。官刊本更多，胡林翼、曾国藩、刘蓉等人的奏议就分别出自湖北、湖南的官书局。近代坊刊勃兴，曾国藩的奏议版本之所以多，即与坊商大量翻印有关，上海鸿文、鸿宝、东方、世界等书局都先后刊印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后出版的近代奏议，大半出自坊商之手。

家刊、官刊大多采用传统的版本方法，费时费工，但质量比较稳定。坊商重视工价成本，江宁书商李光明承刻《李文忠公全

书》，竟以工价问题和李经迈涉讼法庭。③为了牟利，坊商有时会偷工减料，质量优劣不齐。1935年东方书局翻印《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光绪二年（1876年）传忠书局汤炳南刻三十卷本为底本，铅印精装，号称“足本”。而实际上传忠书局原本收曾国藩奏折（片）八百九十七件，而“足本”只有七百零七件，相差甚多。而且，“足本”错字、脱字、衍字连篇，让人无法卒读。故我们在使用近代奏议时，当对其版本有所考察选择。

（待续）

注：

①《内阁官报》宣统三年十月初三日。

②汪兆镛《〈邓和简公奏议〉序》。

③《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372页。

李慈铭赠“姬人”书题跋

清同治七年（1874、甲戌），李慈铭购得一部清乾隆十八年天都黄晟槐荫草堂刻的巾箱本《太平广记》，随即将此书赠与“姬人”，并于目录后写下了得书经过。

向有此书久失去，坊间所见皆翻刻本也。甲戌正月阅厂市，复得此原槧本，亟以京泉四十六千购归，阅之，则讹夺较近刻反多，然精整可爱，以付姬人。 越缦记

“姬人”为谁，未考。然书价、刻书质量、装订外观，皆是实情，读《广记》者也可以作为参考。

· 薛 英 ·